

# 汉语方言连读变调研究综述

陈 忠 敏

通常认为,汉语的绝大部分字都是一个字代表一个语素,每个汉字有一个单字的声调,简称单字调。字与字组成字组。在语流中,字组(两个或两个以上)内的各个字的声调往往跟本身的字调不同,这就是连读变调。

比较早注意到汉语方言里有连读变调现象的是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1928年赵元任在他的《现代吴语的研究》里附有吴语单字调、不成词两字声调及成词两字声调的调查表格,在书的第四章吴语“声韵调总讨论”里说,上海“两派阳平上去单读时都不分(阳=养=样),在词句中阳平跟上去不同。”(《现代吴语研究》P82 科学出版社1956年11月)说明当时赵元任已注意到单字调在词句中有变化。比赵元任更早的一些外国传教士在细致描写汉语方言的同时,也注意到了类似的现象。如1853年J·Edkins《上海口语语法》(《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8)一书P22说:“两个阴去相连(调值为高升),前字阴去复读成阴上高平调。”

1953年G·A·Kennedy发表在《Language》上的《Two tone patterns in Tangsic》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早期关于单个点的连读变调的文章。他在文章里指出浙江塘栖话(今属吴语太湖片湖州小片)有A、B两种变调形式,A种叫“高山型”(pattern A,“High mountain”),即前字的单字调扩展到整个两字组;B种叫“烧汤型”(pattern B,“Cook Soup”),即无论后字是什么调,前字都变为一种平调。偏正式两字组,重音必须在前字,用A种“高山型”变调;动宾式两字组,重音必须在后字,用B型“烧汤型”变调。G·A·Kennedy当时已注意到塘栖话语法结构与连读变调的关系。该文还应用结构主义语言学替换、比字的方法来说明变调格式的异同及调类的分化和合并(Kennedy 1953)。由于Kennedy的文章用英文写成,发表在国外,也由于当时特殊的学术气氛等等因素,该文在国内的影响并不很大。

王福堂的《绍兴话记音》(《语言学论丛》第三辑,1959)对绍兴话的声韵调的发音特征和包括诸如文白异读、内部差异等的声韵变化作了较为详尽的描述,而且对绍兴话声调的两字组、三字组连读变调作了简明的列表式记述。这是国内较早全面系统记录吴语连读变调的文章。(吕叔湘于1947年写的《丹阳话里的联词变调》成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七卷,曾比较简略讨论丹阳话的两字连调。吕氏1980年文《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是对1947年文的补充和修订。吕氏该文发表在《方言》80年第二期。)《绍兴话记音》把两字组按成词和不成词分别列表。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种连读变调的调型是不同的。该文认为利用这种不同变调能区分一些汉字形式相同,意义不同的词或词组。

如“花红”作为一个果子和作为“花颜色红”解的“花红”具有不同的调型。其后，郑张尚芳的《温州方言的连读变调》（《中国语文》1964.2）对温州方言的连读变调现象作了极为精细的分析。该文对连读变调的归类，处理方法，后来常为其他方言学者沿用。而真正全面掀起对方言连读变调的调查及分析是1979年《方言》创刊以后。李荣在《方言》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温岭方言的连读变调》，文章全面讨论温岭方言两三字组连读变调，着重用比字的方法来证实调类的分化和合并。如温岭方言阳平和阳上单字调相同，但在两字组里，除了去声后头外，阳平和阳上都有区别：

桃 = 稻 dɔ<sup>31</sup>，但

桃花 dɔ<sup>31-35</sup> huo<sup>33</sup> ≠ 稻花 dɔ<sup>31</sup> huo<sup>33</sup>

皮 = 被 bi<sup>31</sup>，但

皮面 bi<sup>31-13</sup> mie<sup>13-55</sup> ≠ 被面 bi<sup>31</sup> mie<sup>13</sup>

用比字方法来证实调类的分化和合并以及分析这种连读变调往往比单字调守旧的倾向，对研究许多方言声调都有指导意义。

以后关于方言连读变调的文章大量发表，仅1979年至1985年《方言》杂志上发表连读变调的文章就有三十篇左右。汉语诸多方言里，以吴、闽语的连读变调最为复杂，所以，以讨论和描写吴、闽语连读变调的文章居多。这一时期，讨论方言连读变调的重要文章还有：张盛裕《潮阳方言的连读变调（一）（二）》（《方言》1979年2期，1980年2期），张惠英《崇明方言的连读变调（一）（二）》（《方言》1979年4期），侯精一《平遥方言的连读变调（一）（二）》（《方言》1980年1期，1982年1期），许宝华、汤珍珠、钱乃荣《新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一）（二）（三）》（《方言》1981年2期，1982年2期，1983年3期），张振兴《漳平（永福）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1983年3期），熊正辉《怎样求出两字组的连读变调规律》（《方言》1984年2期），汤珍珠、游汝杰、陈忠敏《宁波方言单字调、两字组连读变调》（《语言研究》1990年1期），五台《关于“连读变调”的再认识》（《语言研究》1986年1期），钱乃荣《吴语声调系统的类型及其变迁》（《语言研究》1988年2期），丁邦新《吴语声调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5本4分），潘悟云《古吴语的声调构拟》（中国语言和方言学术讨论会论文，美国奥克兰1986），Michael Sherer《A Synchronic Phonology of modern Colloquial Shanghai》（CAAAL monograph Series, No.5），Ballard, William L.《On Some Aspects of Wu Tone Sandhi》（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No.19,1980 TOKYO），Anne O. Yue-Hashimoto《Tone Sandhi Across Chinese Dialects》（《Wang Li memorial Volumes》Joint Publishing Co.HK 1987）。综观上述文章，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单字调与变调的关系。跟citation tone和Sandhi tone相对应的名称，早期国内叫做“本调”和“连读变调”。“单字调进入字组，字组往往起变化。一个字作为一个单字的声调是它的本调，作为一个字组的一部分的声调是它的变调”（吕叔湘1980）。这是国内语言学界对“本调”和“变调”的传统解释。这种解释是从“汉字本位主义”出发对声调系统进行共时描写而得出的。如果仅从共时平面着眼，“本调”和“变调”的概念自有其方便之处。但是，一用到历时研究里，这一对概念往往会产生误解，以为

“本调”就是字调的原始面貌，“变调”则是变化的结果。但许多方言里，所谓的“本调”比“变调”更简化，即单字调中不能区别的调类，可以在连调中区别开来。如上述温岭话阳平、阳上就是这种例子。许多闽南方言里“本调”阴调类调值低，对应的阳调类调值高，可是在变调里，阴调类变调调值高，对应的阳调类变调调值低。从历时的观点看，倒可以说“本调”是“变调”的变化结果。(Anne O.Yue-Hashimoto 1987)所以以后许多学者认为脱离具体方言，笼统地纠缠哪是“本调”哪是“变调”是说不清楚的。应该抛弃“本调”、“变调”的说法，从共时的角度重新认识连读变调(五台1986)。连读变调一旦形成，即与单字调平行，独立地发展。它们有互相影响和作用的一面，更有它们自身的发展归并的一面(钱乃荣1988)。

由于许多方言里古调类在单字音中合并消失，却还保留在连读变调中，因此，许多学者尝试用连读变调来拟测古方言的声调调值。如丁邦新曾提出：“变调即原调”的看法，并对吴语的古调类的调值有如下的拟测(丁邦新1986)：

	平	上	去	入
阴调类	55	35	42	<u>55</u>
阳调类	22	13	21	<u>22</u>

潘悟云也用类似的方法对古吴语的声调进行了构拟(潘悟云1986)，但具体的拟测结果跟丁邦新的略有不同。

笔者认为，连读变调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声调的面目，如有些古调类在单字调中合并消失却能在连读变调里反映出差别，但又不尽然。利用连读变调形式来构拟古调类调值时，必须谨慎处理和分析连读变调所反映的四方面情况：(1)有些连调调值可能是历史形式的存留；(2)有些连调调值则反映是音节相结合时发生语音学上所说的音联(juncture)变化；(3)连读变调一旦形成即与单字调并行，独立发展，所以有些方言的连读变调反而比单字调简化；(4)必须重视同一方言内的社会变异，如上海市区话老派连读变调比单字调保守，但新派则比单字调简化，演变得更快。

二、变调跟词义、语法结构的关系。连读变调跟词义的关系本文专指一种带有小称义的小称变调。这种靠变调表小称义的形式多见于吴、徽、闽、粤等东南沿海方言。郑张尚芳的《温州方言儿尾词的语音变化(一)(二)》(《方言》1980年第4期，1981年第4期)对温州话这一现象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以后黄景湖也报导了闽语大田后路话的类似现象(黄景湖1983)。黄家教、崔荣昌(1983)陈锡梧(1966)、周祖瑶(1977)、叶国泉、唐志东(1982)有对于粤语小称变调的报导。以后平田昌司《“小称”与变调》(平田昌司1983)陈忠敏《宁波方言“虾、猪、鸡”类字调变读及其原因——兼论汉语南方方言表小称义的两种语音形式》(陈忠敏1992)曾对汉语方言，特别是汉语南方方言里的这种小称变调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南方方言里小称变调来源于“?化小称”。

连读变调与语法结构的关系是指(1)成词和不成词变调问题；(2)各种语法结构字组的不同变调表现。这两个现象虽然早就为美国学者G.A.Kennedy 1953年及赵元任1966年(《吴语对比的若干方面》，收于《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中国社科出版社1985年版)所论及，但是以前的讨论均甚简略。如赵元任曾用苏州话的“放生”和“放参”作例(《吴语对比的若干方面》及《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提出

吴语中不同的连读变调能区分词和词组。王福堂也认为利用不同的变调能区分成词、不成词的字组(王福堂1959)。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吴语中有些词与词组的区分能靠连调的不同区分,但更多的是不能区分。基于此,Ballard(1979)和Sherard(1980)提出“语音词”(phonological word)这一概念。即在语流中,每两个停顿之间的语言片段就是一个语音词,每个语音词都有一个独立的声调。声调是超音段的,所以,一个声调可以覆盖两个或更多音节的语音词。单音节语音词的声调就是通常所说的单字调,双音节、多音节的语音词声调即是连读变调。语音词是一个语音学的概念,跟语法学里的单位没有直接关系。它可以等于语法上的一个词,也可能不是。从语音形式来看语音词,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一些特点:两头以停顿为界,结合紧密,内部不允许有停顿;音节长度明显缩短(如一个双音节语音词的长度并不是两个单音节长度的简单相加);整个语音词共用一个声调轮廓,并有轻重的节律,重轻型语音词的声调轮廓一般是首字单字调的某种形式的衍化,轻重型则首字末字都对语音词的声调轮廓有影响;字组内部有特定的声母、韵母变化,而这种变化一般不发生在语音词与语音词之间的边界上(石汝杰1987)。一些学者还用语音词的原理来分析具体方言的声调系统。如Sherard 1989,汪平1988,钱乃荣1988等文。

吕叔湘《丹阳方言的声调系统》(《方言》1980年2期)揭示了下述语言事实:字组的结构形式、词性和词义等方面的不同,都可以影响到变调。例如偏正字组、并列字组倾向于变调,动宾词组、主谓词组倾向于不变调,而动补词组则介乎两者之间。以后张惠英《崇明方言的连读变调》一文,则更为详细地描述了类似现象:“前字为上声去声的两字组连调随两字组的语法结构而定”。张文因此把全部两字组分为广用式和四种专用式来讨论。许宝华等人的《新派上海方言的连读变调》一文则用“窄用式”来统括各种专用式。“广用式”、“窄用式”、“专用式”是新出现的研究连调的概念和术语。侯精一《平遥方言的连读变调》(《方言》1980年1期)指出山西平遥两字组可以根据变调行为分成三类:A类是述宾式、主谓式;B类是偏正式、并列式、谓补式,名词叠字、儿尾名词也属于B类;C类是动词叠字。平声单字调不分阴阳,作为两字组的前一字,B类分阴阳平(叫区别式),A类、C类不分阴阳平(叫合并式),因此,分解阴阳平要把连读变调和语法结构结合起来研究。

三、连读变调类型的讨论。Anne.O.Yue-Hashimoto 1987年文根据变调字组中前后字的作用及跟单字调的关系,总结汉语方言里的三种较为典型的连读变调类型。它们是:(1)首字定调型(first-syllable dominant);(2)末字定调型(last-syllable dominant);(3)条件定调型(local modification)。首字定调型是指首字的变调调形跟单字调相同或相似,后字的变调调形跟单字调差异大。

(未完,待续)

国内代号:22—7

国外代号:Q871

国内统一刊号:CN14—1059

定价:1.50元

ISSN1000—2979

邮政编码:030006

编辑部地址:太原市并州南路38号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内